

革命老区南平为什么能『红旗不倒』

□王盛泽

南平是福建省最早建党、最早举起武装斗争旗帜的地方之一，是“红旗不倒”的地方。南平俗称闽北，是一块红色圣地，这里书写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画卷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
福建省最早建党、最早举起武装斗争旗帜的地方之一

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，闽北的有志青年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，纷纷外出求学，接受了马列主义。在北京求学的杨峻德，与李大利建立了亲密的师生情谊，得到李大利的悉心指导，与在北京大学就读的葛越溪创办《建声》半月刊，宣传新思想，开展学生运动；在南京金陵大学求学的徐履峻、徐淮等，在王荷波、邓中夏的引导下，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。还有一批在上海、汉口、福州等地求学的青年，他们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或共青团，成为闽北最早的革命领导力量。

1926年夏，杨峻德、葛越溪、潘作民等受党组织委派，与中央直接领导的中共福州地委取得联系，在闽北开展建党工作，7月正式成立了闽北第一个党组织——中共建瓯支部，葛越溪任书记。闽北成为福建最早成立中共党组织的地区之一。

党的八七会议后，党中央派遣陈昭礼、徐履峻回到闽北重建党组织。1927年7月底，成立中共崇安特别支部，徐履峻任书记。8月上旬，陈昭礼到建瓯与葛越溪等接上关系，根据中央指示，成立中共闽北临时委员会，直属中央领导，陈昭礼任书记。随后，中共建瓯县委和中共崇安县委相继成立。闽北党组织的成立，使闽北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。

1928年上半年，崇安县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福建省委指示，积极进行武装暴动的准备，发动群众，建立民众会，筹措武器，扩大武装力量。发动了两次“上海暴动”，处决反动分子，烧毁地契债单，破仓分粮。暴动区域迅速扩展到崇安、浦城的许多村庄，土地革命的烈火燃遍闽北大地。此后又发动了以松溪渡下桥为中心的建（瓯）松（溪）政（和）农民暴动。这些暴动，实现了以崇安为中心的武装割据，为闽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条件。

创建“方志敏式”的模范苏区

闽北是一块比较独立的苏区。1930

年7月，闽北划入赣东北特委领导，后成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闽北红军第55团、教导团1500多名战士开赴赣东北，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10军。1931年4月和1932年9月，方志敏、周建屏率领红10军两次进军闽北，给闽北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，有力地巩固了闽北根据地。

闽北和赣东北革命根据地都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，勇于创新，创造出许多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方式方法。在上海暴动期间，崇安成立“民众局”，真正体现了人民政权的性质。方志敏对闽北革命根据地极为关心，多方指导，并派出黄道、黄立贵、吴先喜等大批干部到闽北苏区负责领导工作。此后以黄道为书记的中共闽北分区委，学习方志敏领导赣东北苏区的经验，坚持武装斗争与政权建设、军事建设、经济建设同步发展的方针，开展了土地革命，加强党组织建设，建立了苏维埃政权，使闽北苏区波浪式发展壮大。

在政权建设上，闽北分区委提出整顿苏维埃工作，使之真正成为群众的苏维埃。注意提拔有信仰的干部，使苏维埃的委员真正代表群众利益，领导群众斗争。

在战略战术上，闽北革命根据地干部群众发挥创造性，形成整套游击战略战术，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，出敌不意，攻其不备，声东击西，避实击虚，打出外线，开辟新游击区。兵工厂利用仅有的一架车床，造出了轻机关枪和几门小钢炮，改良迫击炮弹。农民暴动中使用的地雷，得到方志敏重视后推广到全闽浙赣边区，在反“围剿”战争中发挥了极大威力。

闽北苏区尽力发展生产，各县都开办有农具、硝盐、榨油、被服、制革、造纸、印刷、木炭、制茶、笋干等工厂作坊，保障了红军的后勤给养和人民群众生活的需要。还成立了闽北分行，在各县设立对外贸易处，开展对外贸易。

这些工作使闽北革命根据地得到较大发展，毛泽东曾多次予以高度评价，并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盛赞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同志们“有很好的创造”“是模范工作者”，赞誉闽浙赣苏区为“苏维埃模范省”。这些荣誉也是包括闽北革命根据地在内的，闽北为“苏维埃模范省”殊荣作出了贡献。

依靠人民群众坚持“红旗不倒”

闽浙赣边区依靠人民群众，摸索出“三大创造”的斗争方法，即武装退却、合法斗争与武装斗争结合、反特务斗争。闽浙赣边区长期属于既不是解放区，又不是大后方，也不是沦陷区的“基本地区”，在执行隐蔽精干总方针下实行武装退却，仍然保持有一定武装力量，坚持必要的自卫斗争。同时注意使合法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，使游击武装成为合法斗争的坚强后盾。还开展了群众性的反特务斗争，采取以“特”反特等有效办法。1943年10月，中共福建省委赣东特派员庄征被国民党抓捕，并企图以他为诱饵达到破坏省委的目的。省委得知后将计就计，通过提供假情报使特务信以为真，并在特务进一步实施诱骗计划时使庄征得以安全脱险，并向组织作了详细汇报，从而使可能暴露的干部得以转移，特务破坏福建省委的阴谋彻底失败。1946年，福建省委书记曾镜冰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时，刘少奇等充分肯定了福建省委的“三大创造”。

依靠人民群众，与人民群众建立血肉联系。在艰苦的斗争中，福建省委领导各级党组织、党员和游击队员学会并增强会冲、会躲、会变、会做群众工作的四大本领，即使在艰难的环境下，仍然坚持做群众工作。机关工作人员一概下乡，战斗员也努力学习做群众工作；把群众利益放在首要地位，想方设法保护群众，尽量减少群众损失；提出要保护群众把我们当儿子而爱护，首先应当把群众当做父母而孝敬，宁愿自己吃不到也要给群众吃，自己穿不暖也要给群众穿；探索出触角式、连锁式、辐射式、爆炸式、跳跃式等开展群众工作的有效方式，还通过“武工队”开展群众工作。通过这一系列的做法，真正建立了与群众的命运共同体，得到了群众的支持与保护。

依靠人民群众，壮大革命力量。在游击战争环境下，福建省委着力建设民主根据地，加强党的建设，领导5个地委、2个特委和10多个工委。解放战争时期，闽浙赣边区执行中央指示，建立了闽浙赣游击纵队，积极发动爱国游击战争，建立了南平、古田和建瓯3个县委16个区的游击根据地。1949年初，将武装力量整编成立闽浙赣人民游击纵队，后来发展到下辖10支游击武装上万人，成为重要的有生力量，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军南下对福建的解放。

（作者系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副主任）

渊子崖保卫战：村自卫战的典范

——渊子崖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

□林凯歌

永远追念的。

日寇打进中国已经快七年了！在野兽们疯狂的烧杀下，多少人被屠杀，多少人流离失所，多少人家破人亡，多少妇女被奸淫，现在是清算血债的时候了！我们知道：烈士的血不是白流的，血的债要用血来偿还！让我们踏着烈士的血迹斗争前进吧！

碑文生动还原了渊子崖保卫战的历史场景，将党与人民团结一致、英勇作战的壮烈事迹呈现出来，并呼吁人民为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而无畏前行。

渊子崖：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村庄

在今天的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板泉镇的沭河东岸，坐落着一个名叫渊子崖的村庄。20世纪30年代，为躲避匪盗祸乱，渊子崖村四周筑起了5米多高、1米多厚的土夯围墙；墙上有条口、枪眼，四个角还各建一座炮台；村自卫队手里不仅有从敌人手里夺来或从社会上买来的少量钢枪，还有几十支土枪和9门土炮，射程达250米，威力不小。

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，沭河以西是日军占领区，八路军则在沭河东岸活动，渊子崖村成了敌占区和抗日游击区之间的“拉锯区”。1940年10月，抗大工作团来该村宣传抗日。年底，村里建立了民主政权，选举林凡义担任村长，并成立了“农教会”“青抗先”“妇教会”等群众抗日组织，不久还建立了村民抗日自卫队，随时提防着日伪军的侵犯。

对待敌人只有一个办法：打！

小梁家据点的汉奸曾多次到村里替鬼子要钱、要粮，都被村民打跑了。与此同时，渊子崖村也因其“拉锯区”的特殊区位优势条件，成了敌人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

1941年12月20日凌晨，到沂蒙山区进行“铁壁合围”的1000多名

日军，经过渊子崖村附近，准备返回新浦（今属江苏省连云港市新浦区）驻点。小梁家据点的汉奸称渊子崖村驻有八路军，并指引日军奔袭渊子崖村。面对穷凶极恶的侵略者，全村312名自卫队队员和老幼妇孺，在村长林凡义的带领下同仇敌忾，利用村子的围墙，拿起土枪、土炮、铁锨、铡刀等英勇抗击敌人进攻。敌人先是炮轰围墙和村庄，村民们用土炮还击。之后，敌人选择相对薄弱的东北围墙猛攻。村民们冒着弹雨，用门板、石块把缺口堵上，等日军靠近就用枪打，家里没有枪的就用石块砸向敌军，用锨、铲、钩等农具打。渊子崖保卫战一直激战到傍晚，最终八路军赶来解围，全村群众得以获救。

渊子崖保卫战打出了农民群众抗战的气势，打出了沂蒙儿女的风骨。为了颂扬渊子崖人民的英雄事迹，毛泽东亲自在延安《解放日报》上撰文，高度评价该村是抗日战争村自卫战的典范，渊子崖村因此被誉为“中华抗日第一村”；1942年，渊子崖村被当时的滨海专署授予“抗日楷模村”荣誉称号。渊子崖保卫战传到日本后，裕仁天皇曾发出长叹：中国平民都如此硬骨头，我们岂能征服中国？指挥攻击渊子崖村的日军联队长坂田晚年撰写回忆录时这样感慨：我至今对我的对手不可思议，“可更让我震惊的是这帮平民！”

抗日忠烈：滔滔沂水泣英魂

面对敌人的进攻，渊子崖村民以“来一个杀一个，来两个杀一双”的豪迈之气，用血肉之躯抵御残暴的侵略者，以落后的武器装备抗击装备精良的敌人。在白热化的战斗中，平地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渊子崖村民拿起铁锨、锄头、菜刀与手持刺刀步枪的

为了新中国——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

有关方面的情报，为区委正确判断形势和确定方针政策，提供了可靠依据。

站著赴死的革命者。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中，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妥协退让政策。陈延年对此坚决反对，他以中共广东区委的名义报告党中央，要求中央坚决抛弃对国民党右派的妥协退让政策，并表示陈独秀和自己虽然是父子关系，“但我是共产党员，我坚决反对妥协退让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。”1927年4月，陈延年赴武汉参加党的五大时，中央任命他接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，他当即转赴上海，途中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。政变后，全国形势风云突变，在极为严酷的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，他不顾危险，有条不紊地部署工作，为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积极开展斗争。

6月26日，陈延年遭国民党军警逮捕。敌人得知他身份后，用尽酷刑将他折磨得体力完肤，逼迫他供出上海的党组织。但陈延年始终以钢铁般的意志，严守党的机密，宁死不屈。

7月4日晚，陈延年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。行刑前，面对敌人的屠刀，他昂首挺胸，视死如归。敌人喝令他跪下，他巍然屹立毫不在意。敌人将他强行按倒，正要行刑，他猛地一跃而起，使刽子手的刀砍了个空。最后，恼羞成怒穷凶极恶的敌人一拥而上，将他乱刀杀害。

他离去时是少年身，归来时是英雄魂。

不仅工作中如此，生活上他也极为简朴。在担任党内重要职务期间，陈延年仍旧处于居无定所的状态。在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之后，他却又因同事结婚无房而主动让出，自己和另一位同志挤进了一间只有几平方米的小阁楼居住。他的卧室常年只有一套床板、一张席子、一条很粗糙的毛毯和一床被子。即使是担任党内重要职务之时，他仍坚持除基本生活需求之



日本士兵展开血淋淋的殊死搏斗。有的仅靠一把农具以一敌众，有的用菜刀砍下敌人的头颅，有的与敌人同归于尽；有的夫妻双双同日军拼杀，有的父子在巷口阻击敌人，有的母女合力同敌人撕打在一起；父亲牺牲了儿子补上，哥哥倒下来弟弟冲上前；一个人倒下去了，另外一个人又冲上去……

面对敌人的进攻，渊子崖村民同敌人展开惨烈的巷战、肉搏战。年轻的自卫队队员林端五用铡刀将冲上来的敌人砍死，自己也中弹牺牲。林端五的父亲林九宣见儿子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，不顾一切地迎着后边的敌人冲了上去，用长矛捅死了一个日本兵，老人也不幸被敌人刺中。面对敌军的包围，林庆海点燃火药罐扔向敌人，自己也被烧成火人。17岁的林庆宝赤手空拳同日军夺枪，牺牲后，双手被刀刺割得血肉模糊。林清义、林九星等十几位老人同敌人拼杀在一起，不幸全部中弹牺牲。

□王 雪

陈延年：29岁牺牲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

陈延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，1922年入党，1924年从苏联回国后先后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、中共江浙区委书记、中共江苏省委书记、中共五届中央委员、政治局候补委员等职，1927年牺牲时，年仅29岁。他短暂的一生为党的建设和大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，毛泽东称他“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”。

求真务实的“小列宁”。1898年，陈延年出生于安徽安庆，是陈独秀的长子。在其父的影响下，陈延年从小就自食其力，立志“自创前途”。1919年12月，陈延年与一批热血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。留法期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与周恩来等人创建旅欧共产党早期组织——中国少年共产党，并被选为旅欧少共中央执行委员之一，担任宣传部长，负责编辑被称为“巴黎的《新青年》”的旅欧少共机关刊物《少年》月刊。

1923年春，党中央决定派陈延年、陈乔年、赵世炎、王若飞等12人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。陈延年学习勤奋、思想活跃，每逢开会讨论，尤其是在辩论一些政治原则问题时，他总是慷慨激昂、出口成章。当被问及为何在理论争辩时与平常的沉默寡言判若两人时，他说：“列宁在争论原则问题时如同猛狮，我们应该向列宁学习，在原则问题上来得不得半点马虎。”于是，同学们都敬佩地称其为“小列宁”。

甘当车夫的领导人。1924年夏，党中央决定抽调留学的同志回国工作。同年10月，陈延年回国后被党中央派赴广州，任命为中共广东区委书记。

担任领导职务的陈延年为为了能深入到广大劳动群众中去，大力开展工

农革命运动。到广州之初便去黄包车夫馆与黄包车夫交朋友，学说广东话，谈人生和社会革命的道理，丝毫没有领导人的架子。他和车夫一起拉黄包车，了解他们的疾苦。他身体结实，拉起来强劲有力，活像个老练的黄包车夫。他替年老病弱的车夫去车赚回的钱全部交给车夫。因此他在车夫中威信越来越高，大家都把他当作自己人，称呼他为“老陈”。人力车工会也因此很快组织起来，发展了大量党员，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。

周文雍曾问陈延年：“香港的《工商日报》刊登文章说，共产党的干部当人力车夫。说的就是你啊！”陈延年笑着说：“如果工作需要，不论任何同志，去当手车夫都是光荣的。”

坚持“六不”的苦行僧。陈延年生活清苦，认为“铺张浪费是最大犯罪”。这句话是1924年12月25日，陈延年在广东区委的第一次见面会上说的。那时，区委刚在黄国樑与全国总工会协调下，租得了文明路75号至81号二、三楼为党团区委地，经济来源全靠党团员每月上缴的月费维持。陈延年领导下的区委能省就省，每次政治示威大游行所用的横幅和标语，都由负责人出钱买红布和纸张，自行解决。

不仅工作中如此，生活上他也极为简朴。在担任党内重要职务期间，陈延年仍旧处于居无定所的状态。在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之后，他却又因同事结婚无房而主动让出，自己和另一位同志挤进了一间只有几平方米的小阁楼居住。他的卧室常年只有一套床板、一张席子、一条很粗糙的毛毯和一床被子。即使是担任党内重要职务之时，他仍坚持除基本生活需求之

